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家 族 論

(五)

繆 勒 利 爾 著

王 禮 錫 胡 冬 野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論 族 家

(五)

著 爾 利 勒 繆

譯 野 冬 胡 錫 禮 王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家  
論  
族  
冊  
五  
The Family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原著者

F. Müller-Lyer

譯述者

胡王  
冬禮  
野錫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殿

六七〇上

(本書校對者 華國章 陳忠杰)

## 第十一章 初期社會化個人演程（二十世紀）

一種社會學演程轉移到另一演程，是慢慢地，并無明白劃分的界限或最終的收場的。我們關於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不能說：「在這個地方，在如此如此的這個時期，一個演程終結，而另一個演程發軔。」變遷的過程差不多是看不出來的，整個演變之流及其停滯和反動的中斷，可比於季節之大輪環中逐日天氣的變化。某些現象是退化的，但從它裏面和旁邊卻發生了，充滿新時代的精神和目的的勢力制度。

所以我們在現代，看出從後期家族演程的廢墟中茁芽出新的思想與生活方式。這些新方向，就它們的主流而言，我們稱之為社會化個人的。

在這個研究人類社會學進化叢書的以後諸卷，將討論初期社會化個人演程重的新特色：種性制度之各種細分，均將加以檢討。第五卷，戀愛的演程（Phasen der Liebe）（註1）考察在一種

組織很嚴密的社會結構中表現於戀愛，婚姻之動機和條件，婦女地位家族結構中的趨向自由的趨勢和尊重個性的趨勢，第六卷命運之馴服之第一部分討論這些在種性淘汰及人口問題中的趨向；這一部分的第二部分（第七卷）是對於教育的研究；這三部曲的第三部（第八卷）討論經濟的和優生的遺傳。最後第九卷，注視人類進化過去以及現在的老年人之社會地位及其將來的展望。

現在我們對種性領域作一鳥瞰，應該答復這幾個問題：（甲）種性的制度與風俗是否真正經過演化？（乙）我們必定要預見靜止或退步的情形嗎？（丙）現代生活之全部種性制度的方向是什麼？

專家和社會學家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意見非常不同。許多人預見退步——一般的物質與心理的退潮（ebb）；許多人相信衰頹和崩落是不可避免的；其他的人，則又認為後期家期演程是引進到範圍更廣大與目的更精美的之一個橋梁。

有人相信發展必須向後退到較早的情形，以求越現代過度的傾向而猶能存在，抱這種思想

的社會學家中，斯賓塞是最偉大的之一——這是將永遠受人尊敬，社會學創始者之一。在其社會學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第1卷中，他指出在較進步的民族中，較大的家族集合（部落及氏族）之解消過程，業已完竣，而現在，小家族單位（按據我們所用家族這個術語的意義）之解體已經開始。以前家族應對社會保證負責其成年人員之正當行為，已變而為個人直接向社會負各種犯罪作惡的責任；而一步一步接着這個變遷之後，使我們看見另一串的變遷，也同樣在其他方面解除了家族的責任。當法律規定收養為父母所凍餒、營養不足或受另外各種忽視的小孩的時候，它接收了家庭的另一種主要機能。當國家對於兒女不能或不願照顧的老年及殘廢的父母負起某種程度的責任的時候，情形也是同樣的。最近的立法因取消父母撫養並訓練他們兒女的精神的義務，更進一步弛緩了家庭的紐帶。父母所施的教育及在他們之下的管教，已由政府監督下的教育代替了。當教育當局認為有為最窮的兒童在能入學以前準備鞋子之類并有設立管理員管束學生是否到校的時候，他們使國家甚至在更廣意義上代替家庭負責了。這種承認個人而非家族為社會單位的觀念，擴張到使許多人把國家的履行父母義務認為當然，甚至對於犯罪

也如此。這些最後的解體徵候，是否代表家族之常態發展的呢？斯賓塞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加以否定的答覆。他相信會有感情未定的急變和法律之反動，即強迫教育，會被廢止，兒童教育會再完全信托於父母，家族會把對國家及自願的共同行動團體所失去了的領域收回。

這是一方面的極端見解。許多權威主張，嚴格家族結構之清算，將引進至活動與組織之更高型式；許多社會主義思想家都屬於這一羣，從柏拉圖自己起到奧文（Owen）傅利葉（Fourier）以及現在的馬克斯主義者止。他們有些已描出種性制的將來，但幻想之富，寧多於論理。集中於承繼問題的改革家，在一定的範圍內，也同意於社會主義者的，例如舍佛列（B. Schöffer）（註11）和契德（Benjamin Kidd）（註12）不過他們在廢止家族承繼來的財產獨占和集中之後，願將社會問題委於自由競爭的裁決。

接受最廣，實在也最通俗的見解，便是說在家庭及家族的神聖大門之前，進化將忽然，並且永遠停止，家族將繼續其現在的結構和地位直到末日。我們要承認，這種惰性在我們文化變革之巨大動力中會等於凌亂與衰落。讓我們考察這種凌亂與衰落的可能性。

這觀點最卓越的發言人之一，是美國的亞當士，他的著作我們已經引用過了的。亞當士相信他發見出並且建立了一個「文明與衰頹之法則」，根據這個法則，資本主義之出現，是軍事的和「想像的」典型（各由武人及僧侶所代表）的末日，他們必然為另一種新典型，買·賣·的·商·業·的·(mercantile)典型所代替。這種商業人，即資本家的財閥，占有了財富之最大部分，大眾陷於飢寒不幸之中，家族失去了它的多產性，婦女失去了她的嬌美，一切藝術及理智活動，也變成腐敗之工具。當社會達到這一階段時，它的滅亡是必然而無可避免的了。

這種悲觀主義根據於我們現代和古典文明之衰落間的一些類似情形。這些類似的確是存在的，但這種神經質的悲觀主義是一個壞的嚮導，正如其相反的極度的樂觀主義，或任何極端程度的情緒一樣，足以歪曲視線和判斷。亞當士對於十九世紀及古代之衰落間的類似，有一種銳利而精確的觀察，但是他對於兩者間極大的差別之盲目，正如他在別方面的洞察一樣是令人可驚的。（註四）



古代後期家族演程與現代間的差異

(一)第一個根本差異是經濟的。在這裏是沒有什麼可比較的。羅馬帝國之全盛期，還在資本主義之初期。但自十八世紀後半期以來——主要地因大規模機械發明的結果——近代世界達到了資本主義之全盛期，它已為其後期演程所繼續。(註五)所以，我們的工業組織和資源，比羅馬帝國高出兩個整階段；而這樣一個更廣大更精緻得多的生產組織，足以負擔一個更自由更多樣的家族典型。實在，它也需要那樣一個更自由的典型。後期古代的個人主義，是早熟而且預先注定的，沒有一種適當的經濟基礎。近代的個人主義，不但根據於正義和情感之上，並且根據於堅實而複雜的經濟結構上，這種結構，無須依附於家族之單位。

(二)更進一步顯著的差別，是關於古代和今日之無產階級的不同。

羅馬帝國的奴隸和無產階級，老早便絕望於這個世界了。他們成了來世的，反人性的，反生命力的基督教之犧牲品。他們希望死後在天國享受無上的賜福，而這天國，是他們的統治者以及富

人永遠不能進去的。所以在政治上他們變成爲靡弱不振者，而他們無望的惰性，剛好爲並不抱持此等信仰的統治階級所利用。因爲大衆之畏意的惰性和他們政治意識之麻痺，獨占與特權遂得以「一暴傳一暴」地繼續下去，毫無忌憚。羅馬帝國之最後期，有些文件表現出統治階級方面感覺充分安全和自信的意識，他們在他們的城牆上沒有看見什麼驚號，他們相信世上一切都很泰然！（註六）

但是，今日大衆和許多有教養的個人的精神和態度，是如何不同啊！在每一個近代國家勞動階級的份子，都組成巨大的會社和團體，並以在這過渡世界取得并力爭較好工錢和生活爲唯一目標！他們有一個新式的新武器，報紙——這是古代所不知的；勞動黨和社會黨的報紙，對於分散的無產階級個人，實在是一個團結的紐帶和巨大的組織力量。從前公然爲剝削工具的國家，也不得不日益注意他們的情形，減少他們生活的困難。「堅決的階級鬭爭」之結果，已經非常有效，足以打破所謂「工錢鐵則」(Iron Law of Wages)了，於是普通人民的收入增高，雖然增加很慢，而且有限。

據卡爾威 (Richard Calver) 說，一八九五到一九〇六年德國產業工人工錢增加之率，略為超過百分之三七，而貨幣購買力只跌落百分之二十二。(註七) 德國工會之總委員會計算，總計工會在一九〇六年的行動，一部分由「罷工」一部分由「和平的協商」得到如下的讓步：(一) 該年份六五二、四七一人的工資增加到四八、七八〇、〇〇〇馬克(二、四三七、〇〇〇鎊以上)；(註八) (二) 時間縮短，三二二、五四二人共四八、八七六、〇〇〇小時。(註九) 而德國貯蓄銀行的存款在一九一二年達一二〇萬萬馬克。(註一〇) 產業工人並沒有衰頹下去，他們正以無限的努力勃興。在政治上和選舉上，大眾是被解放了；社會的解放也正在開始。從來生活在無產者的或似無產者的(半無產者的)狀態的三分之二的公民同胞，成了受過教育，活潑的，自覺的公民，和近代文化社會的完全份子。(註一一)

工會對面有大雇主的組織。但今日典型的大雇主，不是地主，而是金融家(甚至比廠主還要多)。奴隸制度已在西方文明中取消了，在法律上已經沒有「束縛於土地」的人了；統治階級與大眾間的關係，比起古代文明來已大為和緩。一種好意與同情的精神，以及公共義務的意識，已傳

播於統治階級之優秀分子中。尤其是在北美合衆國，大私有收入的一部分，用於慈善的，市政的和科學的用途，輔助并美化都市和大學。一種利他主義的精神，大所有者目擊有那麼許多凍餒者所生的義務感和羞惡心，日益增多地表現出來，但這是古代文明所沒有的。

(三)近代在科學中，找得了一個頭等的和有無量可能性的文化力量，科學帶來了光明和幫助，並且擴大開展了人類精神的視線，而在古代，人類是唯有被遺在最黑暗的愚昧中的。社會學是科學的一種，它把科學應用到研究人的方面，它使我們認清文化和進步是一種進化的連續，而將古代世界毫無所知的新目標和新目的，提出於我們之前。(註一三)社會學不僅照耀將來，並且分析過去，它啓示事物的原因，並且建議解放與發展之最好方法。它使我們能够操縱那些黑暗的原始力量，而在古代世界只有墜在這些黑暗勢力中做愚昧與無可救藥的犧牲。總之，它將運命的鑰匙交給我們手中。包括古典與中世時代的人類歷史之那個很長的時期，是消極的，然而我們卻在一個積極的和創造的人性文化之開始了，這種人性文化，憑藉了我們對進化的自覺的認識，來再造世界。(註一三)

(四)種性制度的及科學的因素，對於另一種傾向，即近代的倫理態度，都有所貢獻，並也都受近代倫理態度的增援。這種倫理態度，或者不如說是在對於一切人類關係和人類行為的公共意見中所發生的革命的變革。道德，如其他一切東西一樣，不是一個刻板的東西，永遠固定和確定了的東西，繼續變遷和增長，很明白地隨着近代生活範圍的日益增大和日益複雜，包括新的情態和新的範疇。在古代部落時期，親族集團是大的社會和道德的中心；戰爭與和平中的同仇敵愾，財物的共有，血族的復仇等等，都是合於道德的，即為種族之生存所贊成而必要的。在第二階段，家族是基本的組織——一個自成世界的系統。賞罰功罪，都由家族分子所分享。今日在中國，父母與子女犯法是共坐的（這大體上已經過去了，雖然這類的跡象隨時仍可發現——譯者，）家族聯合起來為它的分子負責。但在我們中間，這種道德法典，已經變為個人主義的，或者不如說，社會化個人主義的將來的法典了。每一個個人為他或她自己的行為負責，並負完全責任，不能為了他人犯法而被傳訊，或受懲罰。在家族之全盛期，很明白，父親的罪，要拖累及三四代的兒女。但我們所有的人道上正當而可忍受的感覺已經反抗這種半開化狀態，並且廢止了這一種社會的金科玉律。假使

我們認爲一個人直接間接爲了別一個人的罪過而受罰是不正當的，那麼，我們也不復能承認祖宗建立了有時性質成爲問題的勞績，其無限的子孫後代，便應該犧牲同胞的利益，坐享報酬和特權。如果罪不能承繼和代贖，那麼功也該如此；兩者都是屬於個人取捨和個人行爲的事情。從前，靠別人的勤奮，靠承繼的收入和地租生活是極其榮耀的；有些懷抱庸俗和偏見的人猶認爲這種生活方法是一種與衆不同而可羨的，但健全的意見，已都承認靠承繼的方法生活於懶惰和奢侈之中，是一種社會寄生蟲了。就是那些有獨立的承繼資財的人，也應該從事於一定工作，事實上確有許多人都這樣做了；因爲不做事的人是由那些做事的人支持的，這事實，大家已很明白了。

道德感情的一種增加的責任感和細緻化，除了在各人感到有從事工作的經濟義務外，也在其他的方向中，表現出來。在古典文明期，把人或動物從容地有意地加以苦痛和殺，害是一種具有最高風趣的公共娛樂形式，無論取格鬪的比賽的形式，或野獸決鬪的形式，或尼祿(Nero)的「以人燈照亮的花園」。至今仍有許多應該做或加以改善的，不過爲一種道德力量的憐憫，的確逐漸爲人所尊敬了。羅馬人鄙視他們的奴隸，認爲是一種劣等種族，但今日對於一切無救者和殘疾者的

責任感和同情感，日益增長：如果這種感情不致常為恐懼所淹沒的話，它將更常見地更強力地表現出來。（註一四）

（五）最後的一種考察可以使我們想到，古典文明民族并不是在「平和而自然的」狀態中「衰頹」的，而是被征服了，他們的制度是為半開化民族所破壞的。我們很難預見那樣的一種結局。當時地中海與西亞「世界」在北方，東方及南方皆為「半開化人」所包圍，而地球之大部分係為極原始民族所居。但在二十世紀初葉，多少具有進步文化的民族——習於都市生活及人為的食物資源的文明民族——已占全人類七分之六。我們的文化程度及技術進步，根基極其廣厚，使我們無須恐懼一種類乎羅馬滅亡的崩潰。而近代文明也不是停滯不進的，在物質及技術方面甚至以難於駕馭的速度運動着。

演程學的注釋

所以，常被指出的我們時代與帝國期羅馬間的類似，根本上是不完全的，主要的差別，在於我

們在產業及技術方面以及其在政治上，科學上，倫理上及種性上所包含的，都要比他們無限的優越。我們是從後期家族演程中出來的，過去是沒有那一個民族經過這一時期而存續下來的。我們有一個可能的將來，這將來在人類史上是一個完全前所未有的時代。歷史，即過去經驗和過去成績，不能在這裏告訴我們什麼有用的事。但在歷史沈默了和思辯的類比欺蔽人的地方，社會學的帝國開始了。

因為在社會學看來，人類文化是一個發展過程，在這過程中，一個演程消失於其中，另一演程接踵而起，自然，在這多股的連環中，並沒有兩個環節恰恰相像。但人類進化的潮流循着自身存在的法則及以一定的與可確定的方向向前奔湧。人類文化的方向，由比較其各演程，由觀察他們特殊的趨勢是可以認識出來的。這些潮流和趨向之比較研究，對於人類活動之總成績，可給我們以進化中的演程學之法則。（註一五）

演程學的方法，對於人類發展各種不同階段及階段中所產生之制度的內在性質，可以作為估量價值的權衡或標準。我們現在將它應用於重要的種性制因素上，同時把種性制進化潮流之



詳細情形保留在本叢書的第九卷中敘述。(註一六)

一 影響家族制度的進化潮流

我們已經說明家族制度正在解消和解體，這種解體，是因為國家及大規模生產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或正在接收從前由家族和於家庭以內履行的工作、家庭的功能歸於萎縮的結果。自大規模機械之應用，及貿易的擴張到國際範圍，整個現代文化之基礎已經變了。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個一般的真理，即在物質及經濟領域中每有一種巨大成就或進步（例如，農業的發現，）在內政上或政治上，宗教上，倫理和藝術上，也就有相伴的和繼起的變遷；而且必然如此。一切文化現象都必須使其本身與生活之物質基礎相適應；與其「每日食糧」適應；種性的，即性與親子的關係亦不能例外。我們所舉的事實，有力證明了家族已經如何強烈地受這些變遷和重新評價的影響。

在家族的範圍以內，它們是否已經告終呢？今日存在的人數，功能，威信都已減少的家族，是不